

注。证明之二,《诗筏》一书收在郭绍虞编选、富寿荪校点的《清诗话续编》第一册(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 12 月第 1 版)。钱钟书《谈艺录(补订本)》所引《诗筏》中的这一节就可在“续编”的 185 页上找到。证明之三,《中国丛书综录》第 3 册第 55 页也收有“贺贻孙撰《诗筏》一卷。”周振甫先生在《读本》的“前言”中还说:“前三类由周振甫起草,后四类由翼勤起草,并后互相传阅作些订补。”就这个注释看,我想这大约是周先生一时疏忽所致,同时翼勤先生在互相传阅中也未发现,因此让它滑了过去。

至于贺贻孙是明人还是清人,这是翼勤先生注释的失误。查赵尔巽等撰的《清史稿》卷 484 有贺贻孙的传记,这篇传记不长,摘录如下:

同时笃志撰述,其学与(胡)承诺相上下者,又有贺贻孙,字子翼,永新人。

贻孙九岁能属文。明季(末)社事盛行,贻孙与万茂先、陈士业、徐巨源、曾尧臣辈结社豫章。及明亡,遂不仕。顺治初,学使者慕其名,特列贡榜,避不就。巡按御史竺重光欲举应鸿博,书至,贻孙慨然曰:“吾逃世而不逃名,名之累人实甚。吾将从此逝矣!”乃剪发衣缁,结茅深山,无复能踪迹之者。晚年穷益甚。著有《易触》、《诗触》、《诗筏》、《骚筏》,又著《水田居激书》。《激书》者,各名物以寄兴,纪逸事以垂劝,援古鉴今,错综比类。

言之不足,故长言之,长言之不足,故危悚惕厉,必畅所欲言而后已,激浊扬清,始自《贵因》,终于《空明》,凡四十一篇。(中华书局版第 44 册第 13334—13335 页)

可见贺贻孙是明末清初的一个有名的文人士,他因不愿为清统治者服务,所以到深山结茅而不愿出仕,晚年生活十分穷困。著有《诗筏》和《激书》等。

1979 年版《辞海》也有“贺贻孙”条:“清初文学家……明亡隐居、康熙时以博学鸿词荐,削发逃入深山。能诗文。有《诗筏》、《骚筏》、《水田居士文集》等。”(缩影本第 1435 页)

据《清史稿》和 1979 年版《辞海》贺贻孙当列为清初文学家。钱钟书《谈艺录(补订本)》对贺贻孙诗的评价是“才力窘薄”(第 533 页)。

至此我们可对这个“未详”的注释作如下的订正:

贺子翼《诗筏》:清初文学家贺贻孙字子翼。《清史稿》有传。《诗筏》是他所作的一部诗话之作,收在郭绍虞编选的《清诗话续编》第一册中。《谈艺录(补订本)》所引的这一节在第 185 页。还著有《激书》等。

这个注注得稍详细些,《读本》后面的三个注就可用参见法。参见法也是注释中常用方法之一,既可避免不必要的重复,又可防止不必要的自相矛盾。

“杨维桢《老客妇谣》辨”补证一则

乔光辉

《上海师范大学学报》1995 年第 3 期发表《杨维桢〈老客妇谣〉辨》一文,作者“从辨《老客妇谣》入手,兼论杨维桢思想”,以为《老客妇谣》应是杨维桢所作,而非朱彝尊所云“殆好事者为之”,进而从分析杨维桢思想来印证此论。笔者认为作者的基本判断是准确的,然又为此文没有提供充足的史实证据而略有遗憾,仅以“藉诗词以言志乃诗词创作中所常见,有时为了抒发胸怀,甚至假设某些情景。古人在诗词中叙说年龄时有过称之现象,如七十余岁称八十,八十余岁称九十,这是不足为奇的”之语来解释杨维桢此诗中

年龄与实际不符之现象显然有些臆断。笔者以为诗中“行年七十又一九”之语正是杨维桢创作《老客妇谣》的佐证,同时也反映了杨维桢去世之前的晚年心态。现藏天津文物管理处杨维桢的草书《梦游海棠城诗》(纸本,纵 30.5 厘米,横 67.3 厘米)一卷可作证明。今将全文摘录如下(字迹有疑不可辨者后加?表示)

己酉春正月十三夜,梦群女御什伍,冉冉自绛云西来迎余。至一所,见宫殿盘郁,西之轩名紫极馆,问一生,竟曰:“海棠城也。”少选,城主者服圣罗袍,戴金

星冠，带流金之铃，从者执节出，诩曰：“余友辰钩子来也。郭(?)人间文口业填已尽孽未?”延竹馆，诸侍设礼作乐。席终，命一姝出胡麻饭一器，劝餐，云：“此子四十年前在台所啖，未尽余粮也，自兹十九年后，尚至此简(?)余主，子其识之?”时余谢别以诗二绝。主者复命一姝出银光纸索书，诗曰：“夜骑箕尾到西清，紫府仙官有我名。莫羨夫容城主好，芙蓉不似海棠城。二女溪头客断魂，鹤声愁杀阮郎昏。海棠城郭君须记，饭熟胡麻第二番。”

余尝谓天地无神仙则已，有则自是我辈人耳。陶弘景为蓬莱都监，李长吉为玉楼词客，韩忠献为紫府真人，石曼卿为夫容主者，吕献可为群仙纠正，黄伯思为上帝典翰，陈伯修为凌波仙客，朱希真为大闹仙伴，方朝散为玉华侍郎，诚何足怪?吾今行年已七十又四，又十九年后为海棠代主，则吾龄当上齐我祖杨佛子之年也。(杨维桢自注：佛子会稽有传，享年九十九，壮年病颊下瘤，遇仙移去背。)是月望日，会稽抱遗老人在云间拄颊楼董识，遗吾铁门诸弟子云。

《梦游海棠城诗》与《老客妇谣》均写于己酉年即洪武二年(1369)，故二诗可相互参照来读。而前者于正月望日在云间柱颊楼写成，表明杨维桢此时尚没有赴京修礼乐书，故此诗当写于朱元璋派詹同征调杨维桢这前，即早于《老客妇谣》一诗的写作时间。很明显，《老客妇谣》中“行年七十又一九”之语是《梦游海棠城诗》中多次出现的“十九年”一词的沿袭，有着特殊的内涵。

“十九年”在杨维桢的心目中占有不同寻常的地位。《梦游海棠城诗》中曾两次出现“十九年”的时间概念，其一为“自兹十九年后尚来简吾主”，借仙人语破天机，十九年后，杨维桢当与仙人团聚；其二，杨维桢更明确指出：“吾今行年已七十又四，又十九年后为海棠代主。”杨维桢意识到十九年后自己将仙逝，成为众仙中的一员。十九年后，杨维桢享年九十三，年龄接近其祖杨佛子，故曰：“上齐我祖杨佛子之年也。”杨佛子是个出名的孝子，曾与朱熹有过来往，杨维桢常以其祖为荣。《铁崖先生古乐府十卷复古诗集八卷》武进董氏诵芬室影明初刊本中附有杨维桢之师陈敢先生的

《杨佛子行》一诗，并有注云：“佛子乃先生曾大父也，陈敢乃先生之师也。佛子纯孝异感，非此诗不能发之。自韩子董生行后，复得此诗，亦可见古诗有源来也。”陈敢诗中记载，佛子母病，其曾割己肉以食母，“嗟哉佛子，孝行绝人人不识……颊下生瘤大如尊，何人戏手瘤上扞……颊下削赘无瘤痕。……今之人有刃股乳诡孝以为名，规免徭征以希其旌，嗟哉！佛子谁比称！”全诗一气贯之，酣畅淋漓，杨维桢铁崖体受其师陈敢影响很大。杨维桢的内心深处向往其祖杨佛子的孝行、高寿知遇仙之说，并引以为荣。

《老客妇谣》一诗体现了杨维桢追求自由生活和自我独立人格的个性心态。自元泰定四年(1327)杨维桢中进士开始仕途生活之后，尽管其有吏才，但不善官场周旋，且嫉恶如仇，在天台毅然为民除去八雕之害，任钱清场盐司令期间，因盐赋病民，杨又涕泣白大府，终获减赋三千；但元季黑暗的政治容不下这位正直的儒生，故其仕途坎坷。1351年红巾军起，杨维桢又疲于奔命，“自王辰兵兴来，遭罹死地者凡四五然。”(《东维子集·心太平铭》)命不夕保的担忧时时折磨着杨维桢。1359年淞之守顾逖具舟楫迎杨维桢至淞之顾庄避乱，从此后，杨维桢便卒意隐居，做起了“心太平人”(《东维子集·心太平铭》)，一直至大明革命。杨维桢习惯了隐居生活，执著于人格完整与个性自由，不肯屈己以待人，“耻以妾妇之道媚于时”(贝琼《小蓬苔志》)。故“南山阿妹北山姨，劝我再嫁我力辞”，杨维桢厌倦了仕途生活，宁可下山采莲，上山采靡，过着给给自足的生活，也不愿再仕新朝。“行年七十又一九”正是杨维桢向往自由天地的心态反映，一方面强调了杨维桢绝意隐居，另一方面，又有表明自己年事已高，精力不足，离大去之期不远之意，同时使句式更加畅朗、押韵。如用实龄七十四岁，不但达不到上述效果而句式也难以对称。

一般来讲，伪造者是不可能理解“十九”在杨维桢心目中的特殊含意的，而杨氏卒于洪武三年(1370)又是众人皆知的事矣，伪作者也不主愚蠢到犯与杨维桢年龄不符这样的简单错误。由是可知，《老客妇谣》当为杨维桢所作。因感金文之不足，是为补。